

第一章 疫情下的「制度優勢」：中共宣傳口徑的選擇、立意與企圖

梁書瑗*

壹、前言

2019年年末，湖北省武漢爆發「新型冠狀肺炎病毒」（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中共內部出現基層治理能力的隱憂。地方官員在疫情初始階段一連串失序的防疫作為，促使外界開始質疑中共基層治理機制、治理能力，甚至引發國際社會抨擊中共政權的輿論。中共一如世界上其他威權政體，永遠都在尋求統治正當性的路途上，對於任何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苗頭」，都將觸發中南海敏感的神經。在這樣的考量下，中南海面對「疫情大考」，唯恐疫情防堵不力而產生衝擊社會穩定的外溢效應，故除了中央自今（2020）年1月中下旬強力介入管控地方新冠肺炎疫情外，並一如既往地發動宣傳機器，引導輿論。

今年中共的宣傳系統在疫情籠罩下，最引人注目地是強化習近平個人的領導能力——「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統覽全局、果斷決策」，但外界較少關注的是，中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下的「制度優勢」（以下簡稱中共治下的制度優勢），對於抗疫成功與穩住經濟有功的宣傳論述。然而，吾人認為，相較於突顯習近平個人領導能力的說詞，強調中共治下的制度優勢，以達反擊內、外部批判中共政權的效果，此舉對於捍衛中共治權更顯重要，實有更進一步探討之必要。本章欲探究：第一，為何中共選擇制度優勢作為回擊外界批判中國處理疫情不當的基礎？其次，宣傳機器是如何建構中國的制度優勢與中共應對疫情的相關作為之間的邏輯關係，以及宣傳中國的制度優勢企圖達到的目標為何？

* 梁書瑗，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本章以下分三個部分，分別說明：（一）在疫情下，中共挑選「中共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優勢」作為宣傳重點的立意；（二）在疫情下宣傳機器建構中國制度優勢的論述邏輯與試圖達成的效果；（三）本章小節。

貳、疫情下中共挑選「制度優勢」作為宣傳主軸的立意

中共於 2019 年年末遭逢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此衝擊分為內外兩個層面：一為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突發性公衛事件的威脅，中共深怕進一步引起中國社會群眾將對地方政府的不滿上升至對中共統治作為的質疑；二為中共政治體系因防治傳染病不力致使疫病進一步蔓延全球，遭受國際上嚴峻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兩者若互為影響，將對中共政權造成不可回復的傷害。因此，官媒於 1 月 21 日首度公開習近平針對疫情的指示時，習除了要求各級幹部「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外，也須「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¹ 可知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央一手抓防堵疫情，另一手則抓宣傳，引導良好的輿論氛圍、講好中國抗疫故事，慎防各項不利於己的輿論發酵。雖然引導良好輿論氛圍、講好中國故事與傳播正能量，均為中共官方歷次管控宣傳口徑的要求，但挑選的宣傳主軸都不盡相同。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中共的宣傳主軸除如以往塑造習近平個人領導能力的光環外，制度優勢也是另一個宣傳重點。以下本章分述疫情爆發初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制度優勢受到哪兩種層面的衝擊，以及中共選擇制度優勢作為宣傳口徑的用意何在。

¹ 〈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人民網》，2020 年 1 月 21 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1/21/nw.D110000renmrb_20200121_1-01.htm。

一、疫情爆發初期暴露出中共基層治理能力之不足

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地方衛生官員隱瞞疫情的關鍵資訊、基層公安打壓醫療人員非公開網路言論，以及中共地方幹部在新冠肺炎疫情警示上的遲滯與管控資訊，不僅無益於防堵疫情，還導致疫情逐漸脫離出湖北省可以掌控的範圍。綜觀這次中國地方官員在應對新冠肺炎的過程中，最關鍵的缺失為疾病預防控制的初期監測及預警階段。當武漢市當地醫院在臨床上陸續發現成因不明的肺炎病患後，在疫情訊息往上傳遞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使傳染病監測系統失靈。當中國的官僚體系面臨未知傳染病時，存在於中國官僚體系中，各部門交錯的利益、權責、監管—被監管、條塊、競爭等關係，使地方幹部選擇管控資訊流動、隱匿判斷疾病是否人傳人的資訊，並致監測預警機制無法發揮警示功能。在新冠肺炎爆發初期，官僚體系既無法提出警示，也無法有效地防堵疫情蔓延。上述地方官員種種失序的作為，在公共衛生領域暴露中共基層治理能力的問題，衝擊中共治下能「有效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優勢。

二、經中央拍板的「封閉式管理」對經濟的衝擊

當中央眼見新冠肺炎的病例已蔓延至海外，深知疫情已越過第一階段，境內感染源不明的患者增加，感染鏈也無法再追蹤，疫情即將失控。習近平於今年（2020）1月22日拍板，將於隔天（1月23日）管控湖北省、武漢市人員流動和對外通道實行嚴格封閉的交通管制。²自中央決議武漢率先「封城」後，表示中央願意承受「封閉式管理」所造成的社會震盪。中國雖將2020年春節假期日自1月30日延至2月2日，但當時中國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仍持續蔓延，故截至今年2月中旬，約有80個城市（如重慶、南京、廣州、深圳、溫州、杭州、天津、成都等）都採取「封

² 〈關鍵時刻的關鍵抉擇——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關閉離漢通道重大決策綜述〉，《人民網》，2020年9月8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9/08/nw.D110000renmrb_20200908_2-01.htm。

閉式管理」。各地方「封閉式管理」雖在管控強度上有所差別，但重點均為降低人員流動、交通運輸的頻率，以遏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雖春節假期於2月2日結束，但由於各大城市「封閉式管理」，省際間與本省內部的物流、人員往來幾近消失，影響所及，製造業、服務業、物流業等產業首當其衝。中國到了2月下旬仍處於停工狀態，各項產業一方面因大量春節過後待返工的勞動力無法返回工作地，另一方面由於物流暫停，上下游產業供應鏈無法啟動，而使整體國家的經濟活動陷入停擺。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規模企業的營業收入、利潤，因各地方政府管控疫情的手段而瞬間萎縮，詳圖1-1、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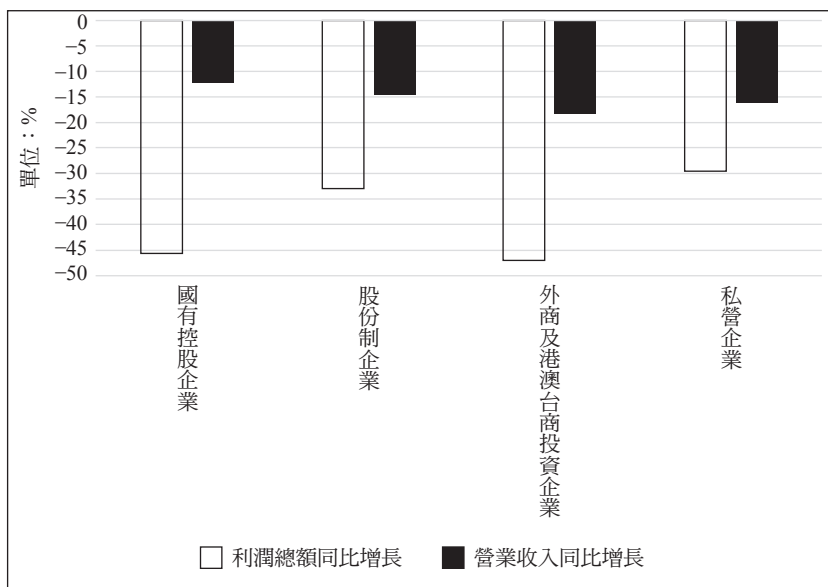


圖 1-1 中國四類規模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率（Increase Rate of Main Business Revenue）與營業利潤增長率（Operating Profit Growth Rate）（2020/1~2020/3）

說明：關於圖 1-1 中國規模企業的四分類彼此並不互斥，例如：私營企業也可能同為股份制企業。

資料來源：梁書瑗整理繪製自〈2020年1~3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36.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27_174173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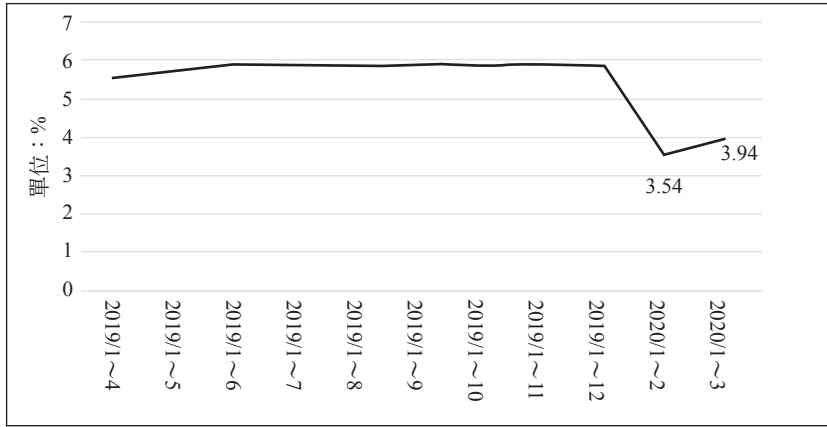


圖 1-2 中國規模企業營業利益率（Operating Profit Margin）趨勢圖（2019~2020/3）

資料來源：梁書瑗整理繪製自〈2020年1~3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36.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27_1741735.html。

三、「制度優勢」作為宣傳口徑的立意

本章認為，在中國面臨「疫情大考」時，因：（一）暴露中共基層防堵疫情不力；（二）「封閉式管理」對經濟的衝擊，故「中共治下的制度優勢」被挑選為官方宣傳主軸，以此彰顯中共的治理效能，重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制度具有國際競爭力，藉此挽回中國的「制度自信」。不論是初期地方政府的失能，或是中、後期中央介入後，高壓防堵疫情的種種作為，不僅對社會經濟秩序造成衝擊，更重要的是，也對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10/28~31）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論述與「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造成負面影響。

據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相關政治文件、領導人講話，³ 中共高

³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網》，2019年11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106/c1024-31439479.html>；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求是網》，2020年1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833.htm。

層不斷強調，「新中國」建立後，經共產黨長期實踐所產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相較於其他政體的政治制度更適合中國國情，為中國帶來高速的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社會穩定，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備在中國實踐的優勢，並因此形成制度自信。習近平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提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否具備所謂的「優勢」，端看實踐的成果。然而，中共信誓旦旦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卻遭逢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暴露出治理能力失序的問題。能否實現十九屆四中全會所通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承諾，恐將受到質疑。⁴ 疫情下，地方幹部治理能力遭遇挑戰，經濟成長也受到衝擊，中南海唯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失去實踐的成果，中國社會對中共統治產生動搖之心。

參、中共針對「制度優勢」的論述邏輯與企圖

中共官方宣傳系統均為「黨的喉舌」，遵守的最高指導方針為「黨性原則」，意即宣傳系統所傳播的訊息，從選題、編輯、論述再到資訊呈現方式等訊息加工的過程，都必須無條件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雖然中國的傳媒產業於1990年代歷經一波市場化，到了21世紀初期又經歷網路科技發展對傳統媒體產業的衝擊，但不代表黨的力量退出傳媒，而失去對貫徹官方宣傳口徑的實力。一旦官方選定制度優勢作為宣傳口徑，便會透過黨委下達意見、官媒內部的審讀制度、媒體從業人員須遵守黨紀等管控機制落實「黨性原則」。⁵ 因此當中共選定制度優勢作為宣傳口徑後，根據「黨性原則」，宣傳系統將啟動建構後續一連串的論述建

⁴ 按照中共的規劃，預計於2021年（建黨百年）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各方面的制度成熟且具執行力；2035年則在制度更加完善的基礎上，大體上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2045年（建政百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網》，2019年11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1101/c64094-31431860.html>。

⁵ 寇健文、梁書瑗，〈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政治科學論叢》，第38期（2008年12月），頁38-40。

構工程。以下本文試圖說明，中共宣傳系統採用何種論述邏輯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疫情下具優勢，以及運用中共制度優勢作為宣傳攻勢，其背後傳遞的訊息為何。

一、建構「制度優勢」的宣傳論述邏輯

當宣傳系統最終的目標在於，引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備優勢輿論氛圍，則必須論述以下兩個問題，方能強化制度優勢在一系列「抗疫」的宣傳說帖上具合理性。在疫情下，中共官方的宣傳目標在於，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與「戰疫」之間的因果關係。由於若要在宣傳輿論上建構起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宣傳系統則須處理以下兩個議題。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何？第二，在定義何為制度優勢之後，又將如何證明，在疫情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備優勢？本章以下則分別闡述中共宣傳系統是如何建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中國「戰疫」成功間的論述邏輯。

（一）在疫情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堅持人民當家作主」

根據中共官方的政治文件、領導人的談話、人民網理論頻道中〈學者聚焦打贏疫情防控狙擊戰〉內的學者評論文章，⁶以及由中國官方、黨校、

⁶ 馬峰，〈【戰「疫」說理】發揮「中國之治」優勢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人民網》，2020年2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226/c40531-31604667.html>；陳付龍、張偉，〈【戰「疫」說理】疫情防控狙擊戰彰顯中國制度優勢〉，《人民網》，2020年3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318/c40531-31636887.html>；趙增彥，〈【戰「疫」說理】從疫情防控狙擊戰看中國制度優勢〉，《人民網》，2020年4月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401/c40531-31657555.html>；張正光，〈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人民戰「疫」〉，《人民網》，2020年2月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205/c40531-31572027.html>；徐成芳，〈【戰「疫」說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人民網》，2020年3月1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310/c40531-31624545.html>；鄭敬斌、王學麗，〈【戰「疫」說理】戰「疫」關鍵時刻，更見中國制度優勢〉，《人民網》，2020年3月1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214/c40531-31587672.html>；房寧，〈人民要論：抗疫斗爭彰顯中國制度優勢〉，《人民網》，2020年9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917/c40531-31864467.html>。

智庫以研究意識形態或黨建為主題的期刊論文為論據基礎，⁷可推知在中共眼裡，雖然遭逢疫情衝擊，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帶來以下「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優勢。

第一，「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中國共產黨替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做了「政治表態」後，便等同向黨政官僚體系發出政治動員的訊號。在中共的政治場域裡，由上級針對某一爭議事件做出政治表態，意即俗稱的「定性」，對於調動下級執行的動機，使下級按照上級政策部署安排後續業務而言至關重要。然而，由黨中央做出「定性」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將由行政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中央也做好全面介入防堵疫情的準備。⁸防堵新冠肺炎疫情一旦轉變為政治問題後，黨中央將會發出政治動員令，要求全國（中國）各級黨政官僚目標一致，採「全國（中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行動方針，迅速調動資源，以最激烈的手段、最快的速度完成遏制疫情的政治要求。

1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要求，在面對險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必須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不移地把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貫徹落實情況要即時向黨中央報告」，⁹並旋即印發《關於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狙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顯示，中共中央已承認疫情險峻，地方不得再掩蓋疫情蔓延的事實，新冠肺炎爆發已不再是政治禁忌。

7 李曙光，〈善於運用制度優勢應對風險挑戰衝擊——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例〉，《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第22卷第7期（2020年7月），頁15-19；肖貴清、車宗凱，〈『大考』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5期（2020年5月），頁26-35；王炳林，〈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9年第10期（2019年10月），頁23-26；張瑞，〈運用制度優勢應對風險挑戰的衝擊〉，《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20年第8期（2020年8月），頁48-51。陳金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話語體系的建構〉，《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4期（2020年4月），頁12-18。

8 周雪光於《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中論及，中國政府往往趨向把行政問題轉化成政治問題，使中共黨組織的克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有效性可透過不斷的政治動員而強化，黨務權威和動員能力獲得合法性。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頁143-149。

9 〈研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網》，2020年1月26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1/26/nw.D110000renmrb_20200126_2-01.htm。

政治定性完成後，中共政治局又於2月3日為了疫情召開第二次常委會，會上中共中央強調「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性。¹⁰一方面，疫情防控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各級黨委除服從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政策與調度資源；另一方面，對黨中央部署落實不力、不服從統一指揮調度，本位主義嚴重、不敢擔當者進行究責。顯示，中央介入管控新冠肺炎疫情，扮演統籌協調各部門，快速投入各方資源，不僅向湖北省派出抗疫指導組（分管衛生醫療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任組長），國務院也成立聯防聯控機制，統籌防疫各項工作，以達成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其次，如何賦予實施「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調動各方資源投入防堵疫情政策正當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第二個制度優勢「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功能便在於此，意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創造出「密切聯繫群眾」的政策。從1月21日習近平首度對外針對疫情下達指示後，任何官方文件、領導人談話開始，便言必稱「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以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為念，「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黨中央介入抑制疫情散播，調動全國資源，幹部施政以防堵疫情為先等種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為，均是出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激發幹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精神」。之所以要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備以人民利益為念的制度優勢，無非是為了藉此取得後續政策部署的正當性。

（二）宣傳系統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備「優勢」的策略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再次復出、全面重掌黨內權力的一次重大會議，在會議召開前，以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陳雲、胡耀邦等人部署了一次在意識形態上打擊「兩個凡是」的論戰。論戰後，中共黨內

¹⁰ 〈研究加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網》，2020年2月4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2/04/nw.D110000renmrb_20200204_2-01.htm。

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藉此削弱「兩個凡是」言必稱毛主席的權威性，擺脫毛澤東個人化的政治權威對政權的威脅。鄧小平也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意識形態基礎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推動市場化改革，並成為中共黨內目前推動各項混合式改革、制度、政策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黨治國理政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開宗明義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不論是從中共黨內的意識形態或官方文件，可推知中共認為，唯有聚焦實踐效果，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¹¹

因此，中共高層歷來在建構宣傳系統的制度優勢論述體系時，除結合事實以說明問題外，也會特別關注制度實踐後的成果，營造基於事實詮釋國家制度優勢的論述方式。¹² 承前述，在疫情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故中共宣傳機器的論述無不圍繞著這兩項制度優勢，以各項政策「實踐」後的成果為素材，對中國社會發動「宣傳攻勢」。中共宣傳系統到底以何種實踐成果為素材，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與中國「戰疫」成功兩者間的因素關係？¹³

若吾人檢視具官方色彩宣傳樣板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外公布），¹⁴ 以及習近平於9月8日召開「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¹⁵ 本章認為，中共

11 陳家剛，〈科學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黨建研究》，2020年第3期（2020年3月），頁49。

12 陳金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話語體系的建構〉，《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4期（2020年4月），頁16。

13 本章認為，由於中共一旦發動宣傳系統，決意針對某項議題採取某種特定論述角度，那麼將會緊縮該議題的口徑，且無法容忍任何擁有對社會傳遞資訊管道的行動者（包含各部門、官媒、市場化媒體、傳統媒體或新興媒體等）提出批判，進而脫離由官方所決定的宣傳路線。因此，僅選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文件與領導人談話論證之。

14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發布〉，《人民網》，2020年6月8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6/08/nw.D110000renmrb_20200608_1-01.htm。

15 〈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20年9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0/1015/c64094-31893514.html>。

主要從（一）境內新冠肺炎的病例數趨緩，以及（二）「復工復產」後經濟率先反彈這兩個層面，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實踐成果。中共宣傳部門對內發動的宣傳攻勢完整地論述邏輯如下：因為中國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兩項制度優勢，因此取得境內病例數趨緩與相較於歐、美經濟率先反彈這兩項「戰疫」成就。

二、宣傳「制度優勢」的企圖

根據目前關於威權政體的研究，威權國家領導人將採取以下三種鞏固政權的策略：（一）鎮壓社會異議份子；（二）威權國家中的政治、經濟等菁英間形成穩定的統治聯盟，共同維繫政權穩定；（三）以良好的政績作為說服社會接受執政黨壟斷政權的正當性。雖區分為三類，但彼此間並不互斥，在現實政治情境裡，威權國家領導人往往採混合上述三種策略的方式取得壟斷政權的正當性。2019 年末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據習近平的說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中南海而言，這不僅考驗中共的治理能力，同時也可能衝擊中共一貫視良好的政績為取得政權正當性的做法。因此，本章認為，中共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平穩（仍持續有零星城市如新疆喀什、山東青島市、天津市出現新冠肺炎群聚感染的狀況），便開始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帶來病例數趨緩與經濟反彈的成果，中共欲達到之企圖有以下三點。

第一，欲展現當國家受到急難時，唯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解決問題。今年十九屆五中全會會後新聞發布會，江金權（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指，「今年，中國率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實現了經濟增長『由負轉正』，再次彰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保證」。據中共官方的說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結合的產物，中共集中統一領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證。意即今日中國取得壓平病例數

曲線與經濟開始止跌，是來自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發揮的制度優勢而帶來的成果，而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揮成效的關鍵，便在於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之下的帶領，及以「人民為先」的施政方向獲得成功。

第二，同樣遭受疫情衝擊，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具備「制度競爭力」，應對自身的制度體系具有自信。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若細究文件內容可知，中共關於治理國家的路線、政策、方針等相關舉措，均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塑了中共的治理體系，而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執行能力，則為中共治理能力的展現。中國這次之所以在疫情中，得以取得相較於西方國家的民主政體更好的抗疫成果，其原因在於，中共有效地落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證明中共的治理效能優於其他制度體系，並藉此挽回「制度自信」。

第三，將「緊緊依靠人民」視為制度優勢的說法，是為確立後續防堵疫情等相關政策之權威性與施政基礎。如前述，疫情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集中力量辦大事」與「緊緊依靠人民、以人民為念」，然二者在實踐上則會產生互補關係。因中共一旦「集中力量辦大事」地全面調動黨政官僚體系防堵疫情，將代表人民將承受各種為防堵疫情而實施的極端政策，而未關照到其他面向的人民權利。但中國因威權政體之故，人民對政府並無良好的課責機制，故宣傳系統必須提出一套要全民「相忍為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否則後續政策施展或引起更大的社會震盪。

肆、小結

本章探討，新冠肺炎爆發後，中共選取制度優勢作為宣傳口徑的立意、意涵與論述邏輯。綜觀上述，本文發現以下結論：（一）中共選取制度優勢作為宣傳口徑的立意在於，重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制度具有國際競爭力，藉此挽回中國的「制度自信」；（二）中共宣傳制度優勢的論述邏輯為，因為中國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中力量辦大

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兩項制度優勢，因此取得境內病例數趨緩與相較於歐、美經濟率先反彈這兩項「戰疫」成就；（三）中共宣傳制度優勢之企圖有三點：第一，唯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解決問題；第二，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具備「制度競爭力」；第三，將「緊緊依靠人民」視為制度優勢的說法，是為確立後續防堵疫情等相關政策之權威性與施政基礎。

從本文結論可知，中共的「官宣」帶有強烈形塑社會意識形態的意圖。周雪光於《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一書中指出，¹⁶ 在中國的國家治理邏輯中，執政黨為乘載克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載體，賦予黨組織的克里斯瑪權威對於確立執政黨的專斷權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克里斯瑪權威若要穩定地運作，不只需要穩定的組織基礎，也需建立於社會價值體系中，因此黨統管意識形態對中共而言至關重要。因為若黨放鬆了意識形態壟斷權，而任由意識形態走向多元化，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則有鬆動的可能，恐將伴隨削弱黨組織權威性的風險。中共成立之初，便以「意識形態宣傳動員群眾從事革命事業」起家，甚至比「槍桿子出政權」的歷史更久遠，藉「筆桿子占領思想高地」對中共政權而言，有著無可言喻的重要地位。

宣傳系統為中共鞏固意識形態的執行單位之一，中共意識形態領導部門與宣傳系統間的關係密切。因此，雖然中共的宣傳管道、宣傳形式隨著科技進展而幾經變化，但中共從未放鬆過對新聞、廣播、文化、影音、電視、出版等新舊傳媒產業須遵守意識形態標準的要求。中共一直存在營造「良好輿論氛圍」的傳統，隨著傳播媒介的進展，資訊分眾化興起，以及國家監控的能力強化，中共掌控資訊的手法日新月異。從管控、裁剪、選擇資訊，進化到監控每一個個體所傳播的資訊。從文革時期的變造照片，¹⁷ 再到引導、刪除網路輿論、監控「微信」聊天室，國家不斷進逼社會上每

¹⁶ 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頁143-149。

¹⁷ 以拍攝文革照片聞名的記者李振盛表示，自己曾在文革時期因政治要求而變造照片。Li, Z., *Red-color News Soldier*, (London: Phaidon Press, 2003), p. 132.

一個個體的私領域，在新冠肺炎爆發初期李文亮醫生的事件便是一例。中共面對因經濟開放而帶來社會多元化興起的局面，仍持續不懈地試圖「力挽狂瀾」，固守「意識形態陣地」。

由於意識形態部門對於維持威權政體的重要性，中共對意識形態著墨甚深，作為其下最重要的執行單位，宣傳系統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但宣傳系統如何與其他業務部門協調配合則相對隱蔽。若未來可系統性地研究中共宣傳系統所傳播的訊息、管理監控訊息的手法，便可在更堅實的論證基礎上，獲知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制，有助於外界更進一步評估、防範其對外的影響力。